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二七期 ——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9e)

【往事如烟】四十余年回首看内蒙文革	程惕洁
【史海钩沉】压伤的芦苇：文革中的钱端升	陈夏红
【难忘岁月】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五）	刘光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往事如烟】

### 四十余年回首看内蒙文革

• 程惕洁 •

#### 一、引言

如果史料能逐年积累而非加速流失，人们的观点能百家争鸣而非一言堂，那么，时间差对于恢复民族的历史记忆来说，未必全是坏事。甚至可以说，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审视和深刻理解，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时间距离（比如说远隔四十余年），甚至一定的空间距离（比如说远在美国纽约）。我不敢说这是否是个规律，但起码，这是我此时此刻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做为一代文革经历者，我们已经步入老年早期。纵使当年大名鼎鼎的文革明星，不论观点派系，也大多数烟消云散，其中不少人已经做古。但做为当年内蒙造反派的普通成员，四十年来我时常回忆和反思那场运动，许多人物事件仍然记忆犹新，无法淡化，难以忘怀。特别是我的老朋友，被称为“内蒙聂元梓”的高树华老师，刚刚六十二岁，两年多前含冤去世，壮志未酬，留下许多文稿托我整理加工。他的突然去世，勾起我许多联想。因此，想借此机会，从社会运动和角色互动的观点，对内蒙文革旧事加以梳理，试图总结成几个略带新意的命题和论点，同与会朋友讨论分享。

## 二、“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交叉互动

这个话题涉及到对内蒙文革的宏观分析，属于所谓“宏观社会学”观察方法。我们都知道，文革发端于毛江“文革左派”同刘邓“走资派”之间的所谓路线斗争，或者说贴了政治标签的权力斗争。在争夺话语权和宣传阵地上，表现为上海《文汇报》同北京《人民日报》之间的较量；在争夺政治领导权方面，则表现在马拉松式的前门饭店会议上（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连续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在同一个前门饭店会议上，最后一场斗争围绕着乌兰夫进行，耗时43天。虽然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后来的文革左派狼狈为奸，给乌兰夫生搬硬套了若干条所谓的“修正主义罪证”（例如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等），但真正打倒乌兰夫及其家族成员的杀手锏，是所谓“民族分裂罪行”，强行制造了一个“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时间（毛泽东反对一切帝修反的歇斯底里高潮）和特殊空间（中蒙中苏边境，国防前沿），中共领导层几乎全体一致给乌兰夫往民族矛盾上拉。因此，官方规定的内蒙文革斗争目标，自始至终有两个东西交叉互动：一个是和全国相同的所谓“反修防修”；另一个则是边疆特有的所谓“反民族分裂”。前一个比较虚，后一个更具体，更紧迫，更要害。

基于此原因，乌兰夫被斗倒之后，不但失去权力，而且失去自由，被事实上软禁在海军大院。而这一切，发生在文化革命尚未正式开始之前。因此，到66年6月文革正式开始之前，遭到清算的乌兰夫及其家族和亲信，已经完全成为死老虎，明摆着的“阶级敌人”。从党政军负责人到普通群众，已经找不到不声讨乌兰夫，不同乌兰夫划清界限的人了。虽然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活动中（1966年某月某日）破例开恩，让乌兰夫也陪同上了一次天安门城楼，从而有谣传说毛要保他。但事后证明，那只不过是毛领袖又要的一次手腕而已。

由于文革开始时，根本不存在公开的“保乌”势力，所以，从六月到九月的三个多月中间，内蒙文革的斗争焦点，主要围绕反不反工作组，反不反本单位的当权派而展开。而工作组和本单位当权派的后台，也不是统治内蒙长达十九年（1947—1966）的乌兰夫及其亲信，而是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的“反乌功臣”，号称“内蒙左派书记”们。他们以自治区和盟市两级的汉族高干为主，仅有一两名象征性的蒙族干部（例如军区副政委吴涛）。

表面上看，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建立的一年多当中，内蒙文革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起码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院，蒙族同学多数，明显站在造反派一边，与汉族造反派一起，先反工作组的镇压，接着反自治区党委的“资反路线”，又反“二月逆流”，最后迎来毛周主持制定的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八条决定，即所谓“红八条”，正式承认了以呼三司为主的内蒙造反派的“正确性”。

但是，从中央煞费苦心地筹备内蒙革委会，到仓促决定头脑简单、对民族政策毫无知识的滕海清出任一把手，到迅速调派27军和69军进驻内蒙战略要地等等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在所谓“路线斗争”的背后，仍然深藏着中共决策层的心腹大患——民族斗争，或者所谓的“民族分裂危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所谓“反修防修”“反对民族分裂”等等耸人听闻的斗争口号，和“阶级斗争为纲”一样荒唐可笑，都是毛泽东这个新时代的唐吉柯德，向历史车轮发起的挑战。果然，从后来披露的历史资料看，滕海清在北京接受圣旨，快速空降内蒙时，是带着深刻的民族偏见而来的。偏见的根源既有他个人的粗暴和无知，更有中共高曾对他的面授机宜。因此，他内心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一个蒙古人，就连他的老搭档吴涛将军也不例外。

滕海清的偏见无知，加上中共高层（毛、林、周、康、江、谢等）对内蒙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坚持误导，基本上种下了后来走火入魔的“内人党冤案”的祸根，为一系列错误奠定了基调。

至于那些枝节性的诱发事件，例如从206专案的沉渣泛起，乌兰巴干个人讲述的演绎故事，到“群专”逼供信打出来的种种所谓“确凿证据”等等，统统都是“民族斗争”路线主导下的必然结果。

如果按照官方十年文革的时间划分，“内人党”冤案肯定属于文革的内容，但是，如果按照刘国凯的三年文革论，那么，“内人党”案件基本上发生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1967年11月）之后到中共九大召开（1969年4月）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虽然从时间上勉强可以归入文革阶段，但同群众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那场迫害蒙古族同胞的大疯狂，基本上是中央到地方，从军外到军内，从政府各部门到基层厂矿、部队、单位、学校、农村牧区，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的国家政权行为，跟文化革命中典型的群众运动没有什么共同特征。表面上看，似乎也有群众参加，有标语口号，有批斗会，有隔离审查等等，但是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派性的介入。因为有滕办和革委会核心小组的直接指挥，因此它应该属于“领导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是“领导闹事”不是“群众闹事”。当然，毛泽东批评“扩大化”之后，受害者大批上访告状，才真正出现了短时间的群众闹事和无政府主义。那属于“内人党”运动的后遗症，不是冤案本身。

官方的文革史，往往将文革期间的种种坏事，一股脑儿推给红卫兵和造反派，而且还简单地把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于是在没有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当中，制造了许多时间、观念和事实上的混乱。挖“内人党”这件事也不例外。即使图们和祝东力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也有抹黑造反派的痕迹，虽然当年的图们，也属于内蒙军区造反派的一员。那么，究竟有没有造反派，充当挖“内人党”的打手和急先锋呢？当然有，比如内蒙军区造反派头头马殿元，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他不但坚决主张和即将参与军区政治部的挖肃，而且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打人。当造反派老战友高树华当面批评他搞“逼供信”之后，他还反骂高是“右倾保守”，“同情坏人”。运动后期，马因为手上有血债，被送到石家庄高级步校隔离审查，据说因精神失常而跳楼自杀。但我认为，马殿元的例子只是个案。既非造反派的组织行为，也非造反派头头的普遍现象。反之，就我接触的情况，多数造反派，都对挖“内人党”的走火入魔，表示怀疑、反感，甚至公然对抗。特别是那些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人。例如内蒙党委“红旗造反团”的那松巴雅尔和白彦太，分别成为内蒙革委会常委和委员。在第一个“内人党徒”特古斯被揪出之后，他俩就公开在会上发言，表示“特古斯是革委会委员”，不经司法程序而任意逮捕，破坏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威信和工作成效。结果，他们的发言被滕海青打断，后来怀疑他们也有内人党嫌疑。其他进入常委会的造反派领袖，例如高树华、王金保、王志友等，也对内人党案表示过疑义。但是，恰恰因为内人党案件是一道圣旨，任何人也阻挡不住。再加上，真正的实权并不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因此，他们的声音才微不足道。假如挖肃运动不是党政军系统的有组织行为，而是群众运动的自发活动，肯定会触发严重的派系斗争，既有造反和保守两派的分化，也会有以民族成员为标准的观点分化。可惜，在整个挖肃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分化。

这里顺便谈谈“内人党”冤案造成的伤亡人数问题。汇集我目前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1，第一种说法来自官方，是图们、祝东力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34万6千多人受到关押迫害，1万2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另有8万7千180多人致残。

2，第二种说法来自反对派运动。例如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认为：逮捕关押了80万人，多达50万人致残，5万人被拷打迫害致死。

3，第三种说法，来自于半官方的学术研究机构。根据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

史》中记录，有2万7千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但资料没有提到被关押者的总数，相信应该在50万人以上。

综合三种说法，我个人倾向于第三种，即关押50余万，致残12万，死亡两三万。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共官方在披露所谓“黑暗”数字上，向来人为缩小，习惯于遮遮掩掩，例如五八年的右派数字，60年代饥荒死亡人数等等；第二，而巴赫先生所说的80万人被关，50万人致残的说法，与我当时做为内蒙日报记者所目击的情况有差距，因为当时全自治区的蒙族人口总数才两百多万，80万人占三分之一还多，似乎比实际情况有夸大；第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现代史研究所，有一批功底扎实，态度严肃的学者（以郝维民为首），他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下功夫，做一番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因此有可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数字。即使这个中间数字，已经占到蒙族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迫害比例之高，在全国是罕见的。

然而，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中共重新启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的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复兴意识开始抬头，海外的蒙族民主运动形成组织，一个货真价实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已经宣布成立多年。总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 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两条脉络

关于文革的分期问题，我基本同意刘国凯有关“人民文革”的论断，也同意他的“文革三年论”。此处不想过多涉及“人民文革”的定义分歧和相关争论，只想以我对内蒙文革的亲身经历，和以记者身份所广泛接触的资料，来旁证“人民文革”的真实存在，以及它与“官办文革”的交叉互动过程。

我认为，“人民文革”在内蒙不但脉络清晰，而且在短暂的几个月内（1966年10月至1967年四月），几乎曾经扮演群众运动的主导角色。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民文革”，是指在文革大框架之内，有限度捍卫民众自身权益的有组织活动。或者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红旗反红旗”。从1966年春夏之交到七八月份，各高校的文革主要围绕“保党委保工作组”还是“反党委反工作组”而展开，总体形势是保守派占优势，有组织、有后台，相比之下，造反派只是被动防守、零星孤立、各自为战，其主要精神支柱是不定期发布的“两报一刊”社论和毛领袖的最高指示。这一阶段，仍然以官办文革为主导，人民文革尚成不了气候。

到八九月份，文革由学校发展到社会，一方面是红色恐怖风暴残害所谓黑五类，另一方面是各单位的党委普遍把敢于率先贴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从而制造了社会上的大批冤假错案，为随之而来的造反派大串联提供了土壤。

从九月份开始，三大原因促成造反派由无组织变成有组织：一是批判血统论和资反路线；二是跨单位的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合法化；三是全国范围的免费大串联。虽然中央文件一直把大串联限定在大中专学生中间，但工人和机关干部的大串联仍然数量庞大，无人干涉，我的感觉他们和学生数量相当。短短一两个月，运动初期被党委和积极分子们压制的落后份子、反党嫌疑、黑五类们，迅速组织起来，成为造反派重要力量。其势头之猛，在中共历史上罕见。按照社会学关于群众组织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只要有魅力型领袖，共同的利害关系，阶梯式的权力划分和有效的奖惩制度，一个组织的战斗力就可以长久维持。

内蒙古几大造反派组织的诞生和成长，例如教育系统的呼三司、铁路系统的火车头、军工系统的河西公司“八一八”，文化系统的“鲁迅兵团”，党政系统的“红旗总部”，部队机关的“红

色造反团”等等，都符号社会学总结的这些特征。即使保守派组织“一司”“二司”，“红卫军”“无产者”等等，也符合上述特征，只不过它们的壮大和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背后往往有当权派（特别是王铎和王逸伦）的策划与支持。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春的几个月内，呼和浩特地区的党政机关全面瘫痪，就连公安系统，也分成誓不两立的派别，分别办案，各自为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人民文革”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有限的空间。许多有明确诉求目标的跨行业跨地区组织，开始成立并筹备活动。例如上山下乡知青、临时工合同工、复员专业军人、下放农村的工人、铁路工人、石油工人、三线军工企业等八大组织。从宣传材料看，他们大多以自己的行业特征为号召力，强调本系统群众所遭受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不公正待遇。到1967年春节前后，正当八大组织在北京酝酿成立全国总部的时候，被江青周恩来等断然宣布为非法，其头面人物遭到逮捕。尽管如此，这些系统的造反派们，仍然锲而不舍，各自在本地区坚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组织抗争。以上八大组织的产生和覆灭过程，如果不归类到“人民文革”，我很难想像它们如何被归类到“官办文革”的范围。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人民文革”例证，是震惊中外的“石拐沟煤矿工潮”。发生在1969年夏秋之交。当时处于“内人党”平反之后的另一次无政府状态。矿务局革委会在情理过期文件档案时，发现有一份煤炭部文革前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工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工4元）。但乌兰夫当时以内蒙财政没钱为理由，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消息传开后，全矿五万多职工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因为累计数量庞大（一千几百万），矿革委会不敢做主，于是触发了长时间的罢工潮。据说全矿职工家属特别团结，原来的两派也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并肩战斗。在数万工人和家属昼夜围攻之下，最后革委会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而另一位副主任（军代表）拒绝签字。最后款是提了，钱也分了。数万矿工和家人的确痛痛快快过了几天大年。

然而好景不长。中央1969年底对内蒙实行全面军管，到70年春，利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的机会，军管会对革委会实行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大礼堂，当众逮捕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来对煤矿工潮的定性：“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及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后来杨、吕二人被判处死刑缓期，补发的款项，再分期从工资中逐渐扣回。

如今回忆那场风潮，我们不得不把它归类到“人民文革”中去。说它是“文革”因为它打着批判刘少奇、乌兰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旗号，要求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说它是“人民的”，就是因为它的利益取向，同中共的利益取向背道而驰，因此最让中共头痛，最让周恩来痛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文革”始终在官方文革的夹缝中生存，只在局部地区或者短暂时间内，展现其影响和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它的存在和意义。因为说到底，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人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政治迷信的最后破除，总要有个缓慢过程。任何质的变化，都需要建立在微小的量变基础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对“人民文革”给予足够的重视。

#### 四，“造反派”与“保守派”壁垒分明

内蒙文革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造反派与保守派两个阵营，起码在自治区一级，基本上阵线清晰，壁垒分明。即使个别组织内部，有重组和改名的情况，例如我原来参加的组织叫师院井冈山，属于造反派当中比较激进的一个，后来在本院大造反组织“东纵”的说服下，集体加入他们的大山头。另外，保守派的“抗大兵团”，最后众叛亲离，剩下寥寥几个骨干份子，

跑到社会上重组了“无产者”，成为内蒙军区依靠的对象。但总体上说，既没有哪个组织自行分裂为新组织，然后斗得你死我活、互相残杀；也没有哪个组织公开宣布解散，然后投诚到对立组织方面去。

造反与保守的搏斗，可以分四次高潮来观察。

第一次高潮，是六月初的大字报运动，率先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基本上构成了后来的造反派。而用大字报反击“右派进攻”，坚持“保卫党组织”的人，构成后来保守派的骨干。

第二次高潮，是工作组工作队进驻以后，其灭火队的面目逐渐暴露，开始整造反派黑材料的时候。于是爆发反工作组还是保工作组的两派斗争。随着红卫兵和战斗队的成立，两派阵线趋于分明。

第三次高潮，是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屁股坐到保守派一边，对造反派开始武力镇压。这时，围绕拥护还是反对军方，又爆发了更大的派性冲突。由于军队有武力做后盾，因此保守派空前壮大。

第四次高潮，是中央发布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之后。虽然造反派士气大振，随着中间派和游离派的加入，人数也迅速膨胀。但保守派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马上瓦解。反而在军区的暗中操控下，一度变得更加嚣张，几近疯狂。闹得滕海青无法下飞机，无法吃饭睡觉。只有在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抓捕了几个军区领导人之后，才使形势得到控制。

我至今想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内蒙文革两派的壁垒分明？我能想到的可能原因，大致有这么三条：

一是乌兰夫势力被清除得比较早，也比较彻底。而新的掌权人物相对说来都没有什么盘根错节的传统势力。

二是内蒙与北京地理位置接近，方便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前来串联。首都各大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在呼和浩特常设了联络站，而且也是一边倒地支持以呼三司为首的造反派。

三是中央两报一刊驻内蒙的记者站和联络员，自始至终同呼三司站在一起。他们经常扮演中央文革派同内蒙造反派之间的联络角色。由于这些原因，内蒙造反派消息比较灵通，头脑也很灵活，基本上步北大清华北航等造反派的后尘，很少犯方向路线方面的错误。而紧跟党委和军区领导人的保守派们，则处处循规蹈矩，按照传统的共产党思维模式办事。而这次文革的发动和进入高潮，恰恰是毛泽东打破传统办事方式的结果，起码是一个“大胆尝试”。所以，保守的领导人和保守的群众落后于形势，继续沿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老皇历，因此屡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就成为必然结果。当然，我们说他们处处被动，仅仅是指从1966到1969年那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如果说把历史的进程拉长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或许保守派并没有错，而是始终坚持了“相信和紧跟顶头上司没错”这个共产党政权下千古不变信条。反倒是造反派被“卸磨杀驴”，充当了另一次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右派上当是上了毛泽东本人“阳谋”的当。而造反派吃亏，是吃了邓小平“反攻倒算”的亏。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当时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恐怕没有谁能料到，毛死之后邓可以翻案，更没有料到邓翻案的实质，并非是用邓的正确，去取代毛的错误。反而用邓新的错误，取代毛的老错误。此是后话，暂不细说。继续分析内蒙文革中保守和造反两大派别的壁垒分明。这种自始至终的一贯性，起码导致了日后事态发展的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压倒性一边倒，基本上给造反派及其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打了一百分，而给保守派和他们的后台“二王”，以及内

蒙军区的将军们打了零分。查遍所有中央八条决议，找不到号召“大联合”的只言片语。而主张两派“斗私批修大联合”，是其后中央处理许多省区两派冲突的重大原则之一。中央在处理内蒙问题上的一边倒态度，对于造反派固然是喜讯，但对受到蒙蔽的保守派群众和广大军人，却是灭顶之灾和晴天霹雳。从而导致了他们顽固而持久的抗争，甚至大闹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到中央对内蒙军区领导人采取隔离措施，才使形势渐趋稳定。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埋下了日后保守派反攻倒算的长远祸根。中央八条下达之初，由于中央文革派，特别是周恩来本人，不但对内蒙造反派全力支持，甚至个人感情上比较偏爱。秉持上意，滕海青到达内蒙之初，做出了若干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的重要决定。例如，追认二月逆流中被解放军枪杀的造反派领袖、师大外语系英四学生韩桐为烈士，由当时的中央内务部（现改为民政部）部长曾山（现任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签署烈士证书；立即逮捕杀人凶手、内蒙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并速审速判柳青死缓两年。另一名被保守派打死的师大外语系俄四学生欧阳儒臣，也被追认为烈士。而打死欧阳的保守派“红卫军”的头头张三林，也被下令逮捕，从快从重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然，在短时间内，这些决定对于稳定内蒙大局起过重要作用，也着实让造反派们高兴过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周毛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抓之后，天地再次翻覆。不但韩桐和欧阳的烈士证书宣布无效，革委会和造反派给韩桐立的墓碑被砸烂，而且杀人凶手也不再是凶手。柳青出狱之后，恢复一切军官待遇，被送到石家庄干休所养老。张三林出狱平反之后，则被复出掌权的王铎、王逸伦看中，提拔到政府当官。原本出身于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张三林，恐怕以前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好事。当然，张三林的发迹，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相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在改革开放年代，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提拔和重用。

如果说，上面所讲的这些个人案例，都仅仅涉及少数头面人物和核心人物，对普通老百姓影响不大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大清查”运动（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则使广大造反派领袖和骨干人物遭受了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从首都造反派的八大领袖（有的说十大领袖）、上海造反派的掌权人物、到各省市、自治区、市地县和公社，各级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尤其是通过三结合进了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们，统统成为清查对象。据说逮捕判刑者数以十万计，开除党政公职者数以百万计，遭到隔离审查、内查外调、需要“说清楚”者总数，则上千万。历时之长，打击面之广，株连人数之众，远远超过文革中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打击和迫害。更何况，十年动乱中，大多数迫害都是中共组织和革委会授意的政府行为（例如“内人党”冤案），属于造反派自发组织的迫害打击行为少之又少。而邓小平复出之后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打击迫害，可是百分百的党和政府行为。

以内蒙为例，虽然上文提到，内蒙造反派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特别小心谨慎，基本上没有让保守派抓到任何致命的把柄，这也成为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个人对内蒙造反派特别信任的原因之一。然而，内蒙造反派并没有因为自身的乾净而逃脱被清算的命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内蒙造反派相对乾净，导致了中央处理内蒙问题时过分偏袒了造反派，过分打击了保守派，反而埋下祸根，造成日后清算造反派时，更加严厉、狠毒，几乎赶尽杀绝。例如：结合进内蒙革委会的那些常委和委员们，郝广德、王志有、李铎、王金保、那顺巴雅尔、贾国泰、李金保等等，无一例外进了班房，最后获致长短不等的刑期。因为从他们身上，难以找到打、砸、抢和个人迫害的具体例证，就找别的藉口抓捕判刑。例如原呼三司司令郝广德，无法以造反派领袖入罪，只好以“破坏军婚”判刑；那顺巴雅尔，以“偷税漏税”判刑。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我的老师和朋友高树华（内蒙师大造反派组织“东纵”领袖）。先是两年多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注意，这是在所谓文革“正式结束”好几年之后），接着是三年

多的正式逮捕和准备起诉判刑。但查来查去，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入罪的“罪名”，连“男女关系”方面的稻草也捞不到，检察院认为实在够不上起诉条件，但清查办的领导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办案人员罗织罪名，判他十年。

事有凑巧，正在僵持之中，高树华的一封申诉信，送到胡耀邦的案头。那时，刚刚复出的胡耀邦，正负责全国落实政策的工作。他对高树华这个人印象颇深，因为1969年春天中共召开“九大”期间，高树华做为九大代表，和胡耀邦在同一个华北组学习讨论，有过多次私下交谈。胡问高如何看待共青团组织，高因为长期担任团委工作，所以对共青团肯定较多，而且认为应该加强团的工作，以便恢复文革之后的社会秩序。他的观点，正中胡耀邦的下怀。大组讨论会上，高大胆发言，支持胡耀邦当中央委员。他的发言，后来遭到江青的当面训斥，胡当中央委员的事也没有成功。但胡耀邦对内蒙这个造反派青年，留学了深刻印象。

胡耀邦读罢高的申诉材料，立刻给内蒙古书记周惠打电话，怒斥周惠，为什么仅仅因为高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判？正是在那段时间，主持落实政策的胡耀邦表示，全国的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的八百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正是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之下，以“和稀泥”著称的周惠，才不得不给呼和浩特司法部门下令，让他们“事实求是”，尽快给高树华结案。于是，高树华才以“免于起诉”的判决，最终走出监狱大门。然而，大大小小的邓小平们，对胡耀邦的“宽宏大量”和“怀柔慈悲”并不认同。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千方百计剥夺造反派们的生存空间。高树华出狱之后，被勒令在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只拿几十块钱的生活费。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费刚刚长到190元。他为了谋生，不得不下海经商，或者到处打工。虽然他的俄语和文学造诣很深，但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之下，没有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敢于聘任他。长期压抑和处处碰壁之中，终于导致积劳成疾，以62岁壮年英逝。其他几位造反派领袖的命运也大同小异，例如王金保、李锋、那顺巴雅尔等人，都在遭受牢狱之灾以后，五六十岁含冤去世。

## 五、“政治立场”与“个人恩怨”微妙平衡

如果说，以上所总结的几个内蒙文革特征（路线斗争与民族斗争、官方文革与人民文革、保守派与造反派等），基本上属于所谓“宏观历史”的考察角度，那么，我想总结的内蒙文革的第五个特征，将从“微观历史”的角度入手，看看个人关系在内蒙文革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众所周知，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历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日益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始关注人际交往和关系互动这类“微观”事件，对宏观历史事件的重要影响。因此，我想试用这一方法，专门探讨造反派领袖高树华，和乌兰夫之子力沙克（后改名乌杰）之间的私人关系，及其贯穿于内蒙文革始终的重大影响力。

要到个人关系，其实胡耀邦对高树华案件的干预，也已经带有个人关系的色彩。因为，假如没有高树华和胡耀邦在九大期间的个人交往，没有他们在“共青团”问题上的共同语言，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高树华给胡写信的愿望。即使写了，也不见得胡耀邦会亲自过问；即使过问，也不见得会那么快、那么热心地直接打电话干预。然而，如果深究，高和胡的关系，严格说来，主要还是工作关系，或者说上下级关系。其关系中的私人成分，远没有高树华同力沙克之间，那么深厚持久，那么神秘隐蔽，那么充满戏剧色彩。

力沙克是乌兰夫的三子，原在苏联留学，专业核物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力回到内蒙，1962年到师范学院教俄语，和高树华同事，曾经和高分配在同一个单身教工宿舍。由于共同的文学和语言爱好，于是成为朋友。两年之后，力调去参加四清，每月的工资由



高送到力的家中。力的母亲云婷是乌兰夫前妻，当时同长子布赫同住。由于经常走动，高有时候也帮助云婷老太太做些家务，因此也和布赫、以及布赫的妻子珠岚等人熟识。前门饭店会议之后，特别是文革风暴一来，乌兰夫家族的成员全部成为黑帮份子，纷纷被软禁、隔离或者正式关押，力沙克也被关进师范学院的牛棚。高树华虽然因为贴第一张大字报而成为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但处境险恶，身世沉浮。直到66年十月批评资反路线以后，才处境好转，基本控制了师院内部的局面。十一月大串联开始。力沙克通过管理“黑帮队”的外语系学生，要求单独见高树华一面。原来他想求高树华，念私人交情，帮他逃离看管，回上海看看久无音信的妻子杨珍云。

这个棘手的要求，逼迫高树华在政治立场和私人关系之间选择取舍，或者谋求平衡。要知道，内蒙文革爆发以来的许多斗争回合，都围绕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议题：那就是高树华造反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高树华究竟是不是乌兰夫黑帮份子？从院党委到内蒙党委，从工作组到工作队，都一口咬定是，而且突破口就是高树华和力沙克的私人关系，因此一定要把高树华打倒。而支持高树华的造反派也一口咬定否，并反击保守派的攻击，认为那是诬陷高树华，将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往黑帮线上生拉硬扯，是政治迫害。

在此关键时刻，如果高树华不念私交，又缺乏政治智慧的话，他肯定会一口回绝力沙克的要求，让他按照“党的政策”或“组织程序”去一级一级递交申请。但高树华的聪明和高尚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虽然也有风险，但基本上稳妥的“私自逃跑”策略：他同力沙克定立约法4章：1，绝对保密，不向任何第三者透露；2，商定好逃跑的路线和方法；3，给力准备好一套伪造的红卫兵证和红卫兵袖章，路上零用的20元钱；4，第二天夜里，高亲自用自行车带力到火车站，送他上车。并嘱咐他逃出内蒙之后，千万不要再贸然回来。何时安全了，高会派人通知他。

第一次的“逃跑”十分成功。但力没有完全遵守约定的计划。他在上海住了半年，就放松了警惕，到1967年夏天，粗心大意地返回内蒙。立刻第二次被抓，受到外语系学生的监管。他再次给高树华写信，要求帮他再“逃跑”回上海，但是遭到高树华的断然拒绝。据高树华自己回忆，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形势已经完全大变，此时的师院，已经不是66年冬天的无政府状态。自治区一级的革委会筹备组已经成立，高树华是筹备组成员之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逐渐恢复。内蒙师院处于军训阶段，校内有军代表驻守，行政管理和审查比较严格。全国的大串联已经停止，红卫兵证不再有用。

力沙克对高树华拒绝第二次帮忙，很是生气。他可能以为，高树华当时在内蒙的地位如日中天，大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据高自己回忆，其实力完全错估了高的个人能量，更对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懵懂无知。这个时候要求高帮忙，高无论如何难以插手。如果走非法渠道，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循正常渠道，等于公开把高自己挂在乌兰夫的线上，正好证明那些反对高树华的人一贯正确。因为此时，从中央到内蒙，正处在新一轮揭批乌兰夫黑帮的高潮之中。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乌兰夫家族一一平反，全家人庆贺大难不死。云婷老太太还专门请高树华到他们的新居，与乌兰夫的众子女一同聚餐。1975年春，高树华在北京参加四届人大期间，同力沙克（改回原来的名字乌杰）再次重逢。乌杰告诉他，“总理病很重，主席身体也不行了，今后是邓小平主事，到那时一切会好起来。”

高半开玩笑地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可能被划到江青这边，到时候你会不会拉老弟一把？”

乌毫不犹豫地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观点，你不会有事的。”

两年以后，高树华被隔离审查。其妻宗馥华投诉无门，想起高和乌1975年的谈话，于是趁去北京出差机会，给乌挂个电话，希望能见他一面。乌的答复很勉强。宗于是打消同他见面的念头，再也没有同他联系过。后来还是胡耀邦的电话起了作用。高树华得以恢复自由，枉受五年多牢狱之灾，还丢了公职和党票，成为孑然一身轻的自由职业者。

1995年秋，高树华出差期间，偶然与布赫在北京的内蒙宾馆不期而遇。布赫态度友善，拉着高树华想拉几句家常，并且说全家人经常谈到他。乌杰也总想见见高。希望再打电话到宾馆，能和高约个时间。此时，布赫已经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几个贴身保镖，急着催促首长，赶快离开人多眼杂的宾馆大厅。而高树华本人，也没有心思同首长深谈。

高当时的心情是：“这年，我已54岁，早该‘知天命’了，我不再似当年毛头小子那般幼稚。我深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圈子，俗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断续相识多年，我却沾不上乌夫亲属这个圈子的边，主观客观皆然。…文化大革命，我是乌夫黑帮份子、乌夫第五纵队；清查中，我又成了反乌夫的罪人。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我已经领教够了，领教得通体透彻，无怨无悔，死也瞑目了。眼下，肥皂泡早已破灭，故事何不赶紧结束。当晚，我断然搬出内蒙宾馆，中止了同乌家这场梦一般的来往。”

通过高树华和乌杰个人恩怨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三条对今后内蒙文革研究不无裨益的特点或者规律：第一是高树华在“政治路线”和“个人恩怨”之间，保持了巧妙的平衡，显示了难得的人性本色。做为造反派领袖，他坚定站在毛路线一边，始终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但做为血性男儿，他并未丧失人性。据我分析，他在决定帮助力沙克“逃跑”的时候，并非没有衡量过风险，当时形势险峻，一旦他的计划泄密，即使仅仅在造反派内部泄密，对他也是巨大的风险甚至灾难。但是，他或许内心深处也不认为力沙克是坏人，或许仅仅出于朋友义气，两肋插刀，总之，最后还是人性占了上风。从高树华的这个事例，使我联想到文革两派与人性多少之间，似乎也有某种联系。由于造反派多数人由文革前受到压制的弱势群体构成，其中不乏所谓调皮捣蛋份子，落后白专份子，和党团组织闹对抗的份子等等，而这些人当中，恰恰包括了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较有头脑的人。他们虽然也喝了不少狼奶，但相对于喝狼奶更多的那些革干子女，党团员积极份子，他们喝人奶的比例仍然偏高，因此，面对复杂政治局面时，稍微还能做些独立判断。

第二，个人秘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例如高树华的这个秘密，一直深藏不露，只有他和力沙克两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即使他的家人和最亲密的造反派战友，都毫不知情。其保密之成功和彻底，可以从内蒙文革的整个历程得到验证。文革前期的院党委、工作组、工作队、保守派，文革后期的革委会、核心小组、滕海青和高锦明本人，直到师院造反派内部分化出的“揪乌联队”等等，都曾经长期怀疑高树华与力沙克有特殊黑帮关系，而且千方百计要揪出他这个“乌夫夫的别动队”，但一直没有成功，高的许多造反派战友，私下里也有人曾经怀疑高和力有某种特殊关系，但也仅仅局限于怀疑，从来没有抓到过任何真凭实据。直到高生命后期撰写回忆录，才透露了这段秘辛，再现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如果高树华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那恐怕这段历史悬案，将永无澄清的可能。

第三，共产党整人之没有原则和标准。从高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共整人手法灵活多变，为所欲为，从来不讲原则和逻辑。要按说，在乌夫家族倒霉的时候，你怀疑高树华和力沙克的关系，揪高树华有理。那么，乌夫平反之后，就应该承认当初揪高树华是错的，起码高树华没罪。但是，因为他是造反派的头头，必须斗倒斗臭，所以，倒打一耙，给高扣上“迫害反对

乌兰夫”的罪名，不管原则逻辑，没有标准尺度。所以高树华自己写道：“当权者两次进攻，都找错了对象。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从高树华和力沙克私人关系的小事情，可以进而推展到中共治国安邦的大政策。例如五十年代的“化私为公”和九十年代的“化公为私”，本为性质上绝然相反的两件事。你要肯定前者，就得否定后者，反之亦然。但共产党就能耍赖，偏偏要把两者说成都对，都有理。对此，秦辉教授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转型国家先把老百姓的东西据为国有。假如如今在私有化过程中，用公正的办法解决还好。不但你现在的私有化让人觉得可以接受，当年的国有化也算是有了个交代——当年我是一片好心，为理想而搞的国有化。现在看看国有制效率不行，公平地还产于民，于前于后都不为一己之私嘛。但是，一旦国有财产被看守者悄悄瓜分了，问题就出来了。现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赃，那么当年的国有化就像是抢劫了。”

总之，一味迷信权力，不讲任何规则、道德与逻辑，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从这方面看，文革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不让讲话，不许争论，只由官方一个声音发言，最终将导致悲剧重演和历史倒退。

（作者为澳门大学社会人文学院副教授）

~~~~~

## 【史海钩沉】

### 压伤的芦苇：文革中的钱端升

• 陈夏红 •

意大利史家克罗齐尝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便历史真的不会再重演，甚或历史真的能够被粉饰，我们依然需要对历史进行不时的反省并从中汲取经验；尤其当一段历史不明不白的时候，这种反省本身注定十分敏感、十分艰难。不得不万马齐喑的时候，我不得不将视角再次对准命运多舛的中国法政人，不管是正面、侧面抑或背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我从来不敢说那些法政界的精英们，在今天就一定能够人尽其材，就一定能够不在现实政治中迷失自己。但他们在他们的年代中的遭际，总让我忍不住浊泪潸然。钱端升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 ◇ 毁书之痛

1957年钱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鲜有文字留世。毕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钱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样。被打成“右派”之后，钱端升除了还是政协委员之外，其他的职位都被撤销。不久后，钱端升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后来听父亲说起那里的情况，在那里还比较轻松，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开‘神仙会’，就是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任务，管理上也是比较松散。但是父亲很苦闷，因为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没事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1973年。”

钱端升在其晚年曾写了一篇《我的自述》，大致回顾了其一生的大致经历。其中曾提及钱大都所指将钱端升从苦闷中拯救出来的事：

值得一提，却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教育

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其时，按原计划我从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译成中文约一百五十万字，译后由我最后校阅，并对原著写简短的介绍。全书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绍，最后加以编者的长序。此项工程颇大，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一百二十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已经经过我最后校阅；我还部分写出作者个人介绍。可叹“文革”伊始，这一小小事业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钱大都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说明：

这个教材没有编写完，文革开始了，书稿也随着大革命的开始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等父亲平反之后再找这个书稿，早已经不知所终。这让他很惋惜，不止一次的说到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可能想不通，不就是一部编译的教材嘛，没有了大不了再从头再来，这有什么好惋惜的？读者诸君明见，“编教材可以说说是父亲在那个阶段唯一可以自慰的事情，然后就又是闲下来闲得发慌。”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百无聊赖的钱端升来说，这本《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已经成为其驱遣漫漫长夜的精神寄托，他不可能不为此感到痛惜。

事实上，钱端升的惋惜远远不止这一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在文革期间，钱端升被查抄的还有其记录了四十多年的日记，“更可惜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有记日记的习惯，大约记了40多年的日记，也一股脑儿被查抄走了。在这40多年里，他到过许多国家，会见过许多名流，是凡他所见所闻，国内外重大事件乃至读书心得，都挤时间记下来，不知这一大捆日记，如今沦落何处？因为从那时起，他受到严重冲击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而且下放到京郊延庆县参加劳动。”

钱端升日记的散失使得我们缺少了一份了解钱端升本人以及中国政治学学术史的可靠的资料，就其历史价值而言，恐怕其损失要远远甚于《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余英时先生在评介胡适日记时说，“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余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

对于钱端升先生的日记，谁又能保证其价值在任何领域都一定低于胡适日记的价值呢？读史至此，竟无语凝噎。

#### ◇ 最感激周恩来

按照钱端升的后人提供的信息，“在爸爸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来的交往，我们觉得爸爸最尊重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

钱端升和周恩来大约相识于1945年、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此后不久，钱端升还应周恩来之邀，去上海周公馆与之讨论国是。1949年之后，钱端升的经历亦与周恩来对其的信任有着莫大的关系。钱仲兴写道：

所以我们相信解放后让爸爸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一定是周恩来的主张。当时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我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与这些国家的往来都是通过民间组织——外交学会来进行的。记得那时爸爸常接待外宾，较有名的如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英国前首相艾德礼。

1956年美国大资本家伊顿邀请中、美、英、苏四国的科学家在加拿大聚会，当时外交部认为我国没人可去，就将邀请信压着没有报告总理，“后来被总理知道了，他说怎么就没人可去？钱端升就可以去嘛！当时爸爸还担心有人不放心他独自去，就请示总理要不要带秘书。总理很放心地说，就你一个人去。”

这个细节在胡适日记中得到了证实。胡适1956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刘锺大使从Ottawa打电话来说，听说钱端升近到Canada的Nova Scotia的一个美国人Cyprus Eaton的庄子上，参加会议。Canada Gov't 特别（准）他入境”。

被打为“右派”之后，钱端升终日郁郁寡欢。周总理知道李四光和钱端升私交不错，便于1958年的某日让李四光找钱端升谈谈，安慰钱一下。钱端升当时对于被划为“右派”亦希望能够向人诉说。“他们约在颐和园见面，走在颐和园后山的小路上，但由于李的秘书紧紧跟随，钱端升始终未能把心底话说出来。”但是这次会面，的确让钱端升感到极大的安慰。

1960年的一天，钱端升带了全家去政协礼堂吃饭，饭后钱氏一家正在二楼的大厅里，突见几个警卫在催促那里的人群快些离去，钱端升一家只好加步准备离开。“突然电梯门开了，只见周恩来大步走来，口称‘端公’，爸爸只能停下。总理安慰了爸爸一番，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对我们在场的家人都一一问及。”

钱端升和周恩来再次见面就在1973年了。是时缪云台先生自美国来定居，总理宴请缪云台时亦邀请钱端升作陪。“爸爸引以为憾的是再一次见总理时，竟会是在向总理遗体告别之时。此后他只是把总理一人的相片挂在客厅中，表示对总理永恒的怀念。”

正是基于这些，度过文革大劫的钱端升，对于周恩来非常感激：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磨难。但是1960年春节和1973年周恩来总理两次给予我亲切的关怀和坦诚的鼓励，却使我永志难忘。可以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饥即食、病即医，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周恩来总理的开导分不开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建交问题出现端倪。而就当时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双方资产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冻结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财产，而美国亦以美国境内的中国财产属于中华民国为由，拒绝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要建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对于当时的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他们以前没有碰到过。周恩来对他们说可以去找钱端升，这样父亲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条发司，研究档案资料，应该根据什么法约来进行谈判。外交部给父亲派了个车，每天接他到那里去。”

◇ “1973年是父亲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1973年钱端升借缪云台归国宴请之机与周恩来见面后，周恩来决定让钱端升出任外交部顾问，并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钱端升指出，“也正是由于他的厚爱，我方能在动乱尚未结束时的1974年就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与思想改造中钱端升宣称“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

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等表态声明相比，钱端升在晚年少了周围的压力，对于周恩来的感激亦已是发自肺腑而且出自真心的。当然问题又出来了。按理说周恩来学问上不如钱端升，人格独立上亦在某段时间比后者差点。那么钱端升为什么还对周恩来如此感激涕淋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党和国家当时又垄断了一切生存资源，按照“皮毛论”的解释，如果知识分子公然与党国体制为敌，那么知识分子将必然因缺乏生存空间而无法存在。周恩来在此作为党和国家统治集体中一位比较照顾知识分子的形象，尽管钱端升此前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了，但周恩来依然能够忽略这种政治上“贱民”的现实，给钱端升以积极的开导，由此钱端升才会对周恩来表现出异常的感激。

#### ◇ 鹊巢鸠占

钱端升的故交费正清先生曾指出，“在此后的22个年头（自1957年算，引者注）中，他住在北京的旧宅，或旧宅的一部分里，拿着少量的生活津贴，他的才能被湮没。”费正清所指“旧宅的一部分里”属于事实，并不算太唐突，文革开始后，钱端升家即所谓“旧宅”，随即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而此时钱端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钱端升一家只能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那么这些挤占钱端升“旧宅”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如同上引文章所示，钱端升的后人们因为种种顾虑只是说“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而钱端升先生直到晚年亦对此守口如瓶。据笔者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讲，当时挤占钱端升家的其实就是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职工。

钱端升的房子被挤占问题，最后在乔冠华乃至周恩来等的关注下才予以解决。在乔冠华外长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周恩来亦要求乔冠华在赴美之前，再到钱端升家商讨一下。乔冠华的传记作者罗银胜指出，“乔冠华领命后，马上进入紧锣密鼓的临战状态。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程拜访外交部顾问、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的钱端升先生，商讨赴美事宜。”

钱大都对于房子问题的解决有着具体的论述：

我们家原来住在离政协礼堂不远的四合院，在“文革”之中住进了很多人，变成一个大杂院。还好，我们没有被赶出去。后来乔冠华主持这项工作，到我们家去，他到我们家一看很吃惊：“你家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开玩笑地说：“门户开放了嘛。现在是门户开放政策。”乔冠华说：“这怎么行，请他们回家。”乔冠华离开我们家之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

由此我们对于钱端升在文革期间的景况有多差，不能不有所深省。

#### ◇ 费正清的诧异

其实，最令费正清感到诧异的，并不是钱端升一直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而是钱端升思想深处的某种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着某种时代的背景。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对1972年访华时见到钱端升的情形是这么说的：

当乔冠华设宴款待我们时，他的老师，逻辑学家金岳霖和钱端升一起参加了宴会。真正是老朋友了，他们穿着新制服，坐着轿车到来。他们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供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乔冠华以大

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建议让钱端升、金岳霖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们。显然，这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安排这件事。当他们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我向他讲述了当我被指责与钱端升交往而同麦卡锡主义者争吵时，他却闭口不谈当他被指责与我通信时的相同经历。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这就简洁地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决不会这样！

如果我们对钱端升保持同情之理解的话，钱端升的这种“加强语气强调”可以看作是一种针对当时公安人员的监控而做的一种样子，此做法乃是保护自己的一种不得不为、不能不为的策略性方法。当然此种状况也恰恰证明了费正清先生的另外一个判断，“正如我现在所知道的，在1972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专业知识阶层的迫害和折磨远远没有结束。毛主义者的平均主义仍然是把专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降至一定程度的托词。”

幸好这不是费正清最后一次见到钱端升先生。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时，费正清再次随行并前往拜见了钱端升，“我为有幸能够陪同琼·蒙代尔去拜访钱端升教授一家，作为对开明人士的一种表示而深感高兴。”

#### ◇ 白发人送黑发人

1982年的时候，钱端升不顾他的身体不好，硬是参加了一个追悼会。这是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为国效力的，由于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死的学生。谢泳先生亦在文章提及类似的事情。谢泳转引《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中的材料，提及了一个叫做田保生的人：

田保生当年曾和凌其翰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凌其翰说，田保生出身清华，是钱端升的高足，后来参加第一届高等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四十年代末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眼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而这个田保生和钱端升的联系即在于，他当年之所以回国正是受钱端升的劝告才回来的。谢泳写道：

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许多人劝他留下来，胡适也劝过他，但钱端升还是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中国，不仅他回来了，还劝他的学生田保生也回来，学生一般都听老师的话，田保生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奔归新中国。回来后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凌其翰回忆说，“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可惜后来田保生和钱端升一样，都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杀，后来才获昭雪。

谢泳所述田保生和钱仲兴所述一个学生的追悼会，是否同指田保生必须得在更多资料的基础上查实。但是事实上，无论其是否是同一个人，已经不是特别重要，——如果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钱端升也只是再多经历一次同样的悲痛而已——重要的是，钱端升在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来送别自己的学生。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学生本身“是钱端升的高足”，而且其回国，又是和钱端升本人的劝说分不开。那么，在钱端升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田保生的死于非命对于钱端升内心的撞击就不难想象了：后悔？歉疚？无奈？……如此种种感情。个中之味恐怕只有钱端升自己知道。

中国人最怕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钱端升经历了这一切。

◇ 这次第，怎一个叹息了得？

应该说，就中国法政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期间的遭际来说，钱端升的经历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钱端升依然是幸运的。他的书和日记被毁了，但钱端升自己还活着；他的房子被占了，但钱端升一家人还能相聚；他发自内心的对周恩来感激，宣布马克思主义还有五千年的寿命，但并不能完全掩盖其早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光芒；他的学生被迫害而死，但钱端升毕竟还能在文革结束后以老迈之躯送别一程。这恐怕正是劫后余生的钱端升生活下去的动力和理由。

但从钱端升前半生的经历和作为来说，无疑从1949年开始钱端升又是极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这二十年时间中，钱端升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术无缘，与政治无缘，与知识无缘，所求不过“饥即食、病即医”，已经不顾知识分子的尊严底线，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对于后人来说，这只不过换得一声叹息，毕竟文革中此类悲剧包括比钱端升还要悲惨千万倍的亦不下千万人。只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来说，这次第，怎一个叹息了得？

2006年4月29日～5月6日于昌平舒云居

□ 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峥嵘》报2006年6月号

~~~~~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五）

• 刘光耀 •

十、“希特勒临死还要结婚”

这个标题是一位先生在批判我的时候的一句原话。

开封“左三红”被摧垮之后，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形式均不存在，但是斗争并未停止，而且各级革委会成了造反派压制、打击“老保”和不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的组织领导机构。

1968年1月26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七，数学系革委会派一位我的同乡同事和一个学生到偃师我家，通知我返校参加学习。我到开封先在卢树森家住了一夜，了解一下学校形势。27日回校。28日下午，数学系革委会召开部分学生会批斗我。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我的什么材料，没有人系统发言，只是让我交代我的“罪行”。我交代得“不好”，就呵斥说我“顽固”，还用鸡毛掸子打我。会议结束时，革委会委员（64级学生）给我戴上了手铐，让去院办公楼。出门后我按习惯向大路走去，押我的学生却叫我走较偏僻的小路。到院保卫组，院革委会副主任段文德（中文系62级学生）在座，组长（数学系63级学生）让打开锁，然后命令我：从明天起，去东郊牛场劳动。这个春节就在牛场度过。

师院办的牛场，有7头奶牛，另有劳动改造的8头“人牛”：“走资派”韩倩之、赵文山（党



委副书记)、傅世海(党委副书记)、郭象天(党委常委、副院长)、翟子荣、戴鸿儒、傅刚(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和“走资派”兼“叛徒”李烈夫(党委常委兼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而我还没有戴任何帽子。我这个没有名份的党外年轻人和那一群老资格的大人物同在一个牛棚除牛粪、锄草、推土,倒毫无拘束,还觉得很开心。这也许是我和他们“臭味相投”吧!然而,我干了还不到一个月,就不守本分了。我去找保卫组长,问:“我到底是什么矛盾?”答曰:“人民内部矛盾。”又问:“走资派是什么矛盾?”(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走资派)又答:“敌我矛盾。”再问:“那为什么叫我和走资派一块劳动?”再答:“刘老师,那你就别去了。”好,这一天我就没去。下午,上班约个把小时,管牛的头儿、姓何的工人(摘帽“右派”)到数学系办公楼吆喝:“刘光耀!刘光耀!”我听到吆喝声躲在了住室墙角。数学系干部左德有和吴迎繁正在我对门打乒乓球。何问:“你们见刘光耀了没有?”他们答:“没有。”其实,他们明知我在屋里。何又喊了几声就走了。原来,保卫组没人去通知他,好像我应该自己带上保卫组长的决定去向他说明。第二天我去了牛场向何牛头解释。何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审讯我,令我低头,并让一个年轻小伙子用木棍打了我一顿。接着又干了几天,姓何的才说:“滚蛋吧!”啊,我想起来了,67年1月份,我和张佳魁等第一次去数学系挨批之后,张佳魁就说过几次:“开批斗会,最喜欢听的就是‘滚蛋!’”那一次,从会场一“滚”到住室,张佳魁“噗哧”一笑,然后向我总结了这个体会。

学校暂时没我的事了,就回家谈情说爱吧。当时,我32岁,蔡淑珍29岁,都只顾“革命”,不多考虑终身大事。蔡淑珍已经从吉林回偃师,又去西安她姐姐处再回偃师个把月了。我们决定结婚。我从偃师返回开封,请系里开介绍信到院办公室开证明。证明开过了,就要起程,系革委会主任(64级学生)告诉我:“为了对你爱人负责,我们派一个女同学(64级学生)到偃师和你爱人谈谈话。”因为那女同学得回家准备一下,我只好去预售点买了两张夜间的火车票。系里老师们闻讯,多有不满意。几个党员对我说:“别理她,只管走你的。”还有说得非常难听的。我说:“算了,已经买过票了,我不怕破坏我们的婚姻,谁也破坏不了。”晚上10点多我步行到那位女同学家,我们又步行到火车站。次日凌晨,我在偃师站东的回郭镇站下车,那位女同学到偃师站下车等我们。近9点,蔡淑珍到偃师火车站和那位女同学谈。谈完后,那位女同学回开封;我和蔡去民政局办结婚登记。路上,蔡淑珍笑着对我说:“她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要我和你划清界限。”“划清界限”,就是散伙。可蔡淑珍不干,宁愿和我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人结合,怪哉!

一般来说,办结婚登记时,工作人员会让申请结婚的人背诵《为人民服务》等等,我们也做了准备,但是没有让我们背。工作人员问完情况后,就要开结婚证,我问了一句:她是造反派,我是“老保”,不知道受不受影响?工作人员微笑了一下,轻轻地摇摇头,点燃一支香烟。这时我才想起,我应该买一盒香烟带上。工作人员再没有说什么,就给我们开了结婚证;并让我们付四角钱,这大概是结婚证的工本费。这四角钱,就是从恋爱到结婚,我总共付出的费用。

我们实行了到许昌蔡淑珍的至好王翠芳家旅行结婚。坐的是夜间从西边来经过郑州向南方去的火车。车上拥挤得要命,走道和两车厢之间挤得满满的,站着连脚活动的余地都没有,淑珍背靠着我一直站到许昌站。车缓慢地停下来。可是,怎么下车?却成了难题。要想从车门口下,非常艰难,极可能被误在车上。幸好,我们离车厢一端的第一个窗口很近,几个好心人劝我们从窗口下,挨窗口坐的两位中年人给我们打开窗户,我先下去,在那两位中年人的帮助下,淑珍爬上车窗,我把她接下车。下车后,天还不亮,我们就在候车室一楼到二楼的楼梯转弯处的平台上偎依到天亮。然后去了许昌师范学校王老师家。

三天后回偃师,趁生产队开会时,给大家行了礼,撒了糖。

吉林永吉县来电催蔡淑珍返永吉县开会，我们的婚假不到十天，就各自返校。

回到系里，一帮人非要吃喜糖不可。我去商店买来糖往桌子上一放，你争他抢，女党员王丽敏摔了个响叉，咯咯咯大笑，全楼都听到了。王为此还挨了训。十年后，到偃师做蔡淑珍工作的那位女同学和我们同住师院西北院，她见了蔡总不好意思，还特意向我们表示歉意。我想，她那时年轻，没有社会经验，要不，她决不接受那样的任务。

1968年4月批斗我时，把我比做纳粹魔王希特勒，说“希特勒临死还要结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希特勒”不是我，我远不够格；“中国的小希特勒”也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但他们也只不过是“中国的比较大的、中等的希特勒”的走卒而已。历史也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我刘某的寿命比希特勒的寿命要长得得多得多。

### 十一、“反革命小爬虫”痛哭主席像

1968年3月，北京发生了林彪、江青一伙为扫清敌手而采用卑劣手段制造的“杨、余、傅事件”。作为“打倒杨、余、傅”的前奏，江青等按照毛泽东的决定，先端出了“王、关、戚”。北京大街小巷布满了“打倒变色龙杨、余、傅！”“打倒小爬虫王、关、戚！”的大标语和各式各样批判他们的大字报。

这股狂风很快波及全国。

我刚结过婚没几天，1968年4月1日，在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系教职工大会上，系革委会委员（教师）宣布：准备批判刘光耀！会后，另一位负责人对我说：“光耀啊，我们对你还不是按敌我矛盾对待。”5日下午召开全系师生大会，我受到了较大规模的批斗，只听喊：“低头！”但没人按，没有武斗。只一位先生发言，稿子很长，题目是：《把反革命小爬虫刘光耀端出来示众》。帽子是从北京借来扣上的，“端出来”一词也是借来的。这样，我就成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线上的人了；而且，和国家副部级干部王力（王力进中央文革前已是国务院中联部副部长）等戴同样的“反革命小爬虫”帽子，似乎“荣幸”（“文革”后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我没有资格戴这顶帽子，那样不就和国家副部级干部平级了）。“希特勒临死还要结婚”，就出自这篇《端》文。全院贴了很多“打倒刘光耀”的大标语。

4月7日下午又开了一次全系批斗我的大会，还是那位先生发言，题目是：《再剥刘光耀一层皮》。9日晚上让我在会上检查。对我的检查不满意，就用鸡毛掸子打我的头。散会出门不远，就被推倒在地，狠揍一顿，眼镜也飞了。后来听说，系办公室工作人员、因家庭出身不好八二四不敢吸收为队员的张华英，见我挨打掉了眼泪，受到训斥。

4月15日下午，全院大会，韩倩之被押上了台，接着，我和艺术系党总支书记翟克让被造反派学生押上台，井冈山头头之一张振江和工人头头卢树森也被押上了台。给我脖子上挂了一块大牌子，上写：“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翟、张、卢未挂牌子。发言人也只有一个，还是5日批我的那位，题目也没变。只对韩捎带了几句。韩、翟、张、卢都是我的陪斗者。押我的两个学生，狠向下按我的头。不到批斗完，我的脚前已滴湿了一大片汗水。

批斗会结束，我被架出大礼堂，刚一出门，体育系的几个彪形大汉就揍我一顿。然后，一个人揪住我的头发，两个人各拉我一只胳膊，把我从大炉渣铺的路上拖到十号楼的一个大套间办公室里，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翟克让也被带了去。……体育系的打手走了，办公室两个学生之一也走了，另一个让我去里间床上休息。翟把我拉起架进里间。我抬头一看见毛主席挂像，便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哭足后，翟扶我上床，他回家了。我神志逐渐清醒，感到头皮刺痛，

右手从前向后一理，四个手指缝全是头发，数了数，64根。晚上10点多钟，那位负责同学进来，他自我介绍是外语系的，说另一位是中文系的；他扶我起床，又给我一根棍，让我拄上，他把我扶回住室。据说，外语系这位同学，还有中文系那位同学，后来被批评为“右倾”。

这一夜我想了许多。我为什么在毛主席像前痛哭不止？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提得很明白：毛主席您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叫这样搞法？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提出质疑。可是，我哪能理解得了呢？1948年国民党军溃退前，伪保长的狗腿子到我家逼苛捐杂税，我母亲遭毒打；而今，我怎么又尝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时期的那种滋味，而且还更甚？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主张按《十六条》行事，反对乱揪乱斗，反对武斗，抵制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能把我和王、关、戚搅在一起？他们操纵、怂恿造反派毁我长城，可我恰是长城的维护者！我“翻案”？翻什么案？谁定的案？我按照周总理指示，呼吁群众大联合，抵制造反派一派掌权，就是“右倾翻案”？我真不明白！

第二天，让我搬到东工字楼上南边正中的屋子里住。那是套间，系革委会副主任（63级学生）在里间，我住外间。

在批斗我的同时，数学系办了陈顺卿、李天增、田继善、左德有、吴迎繁等5人的学习班，旨在揭批刘光耀，并各自检查自己。

过了几天，数学系贴出大标语：“把反革命小爬虫李天增端出来示众！”并在全系大会上批斗，挂的牌子是“坏头头”。接着，又贴出“把反革命小爬虫陈顺卿端出来示众！”也在全系批斗，挂的牌子是“大滑头”，吃饭、上厕所也得挂在脖子上，回屋时挂在门上。各个单位都端出了“小爬虫”。体育系贴出一张大漫画：一棵大树——“爬虫树”，党总支书记坐在地上，脚夹着、手搂着树，树干、树梢儿都是“小爬虫”，共七条，何其多！人才辈出的古老大学开封师范学院，当今盛产“小爬虫”，而且还“反革命”！

4月下旬一天午夜，我被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几乎丧命（下一节详述）。

在我伤还没有好的5月初一天早饭后，我和韩倩之挂着大牌子上了一辆大卡车，外语系的学生队伍跟了过来，车开到市政府大院，给我换了块牌子，上书“坏头头”三个大字。我的“名份”变了，帽子换了。然后游街到汴京公园南边的汴京球场。场上已站满了人。我和韩倩之被带到台子上，随后，开封市教育局局长和几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等5个人也被带上了台。批斗会开始，先由师院外语系一个学生发言。他批韩倩之的内容没有多少，主要是批我。今天，我又成了主要批判对象。会后又挨了一顿打。返校后见校园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坏头头刘光耀！”

看来，我是个“头头”，虽然我在“老保”组织里的职务很小，但如今成了“小爬虫”们未经选举而被“上级领导”任命的“头头”，要不，为什么只我一人在全院、全市大会上被批斗？

没过几天，我被叫到体育系一间房子里，一位教师主持，几个学生手里拿着木棒，那位教师要我交代和他系“老保”的联系问题，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学生就用棍棒“伺候”个够。

又隔几天，师院附中一位曾经和我合作管理一个班的女教师（“文革”开始时，学生曾把她的头发剃光，可是她也参加了造反派）领着几个学生到我住室，说我是附中“老保”的后台，要我交代。我是在1965年上半年去附中锻炼的，“文革”中从未同附中的人有任何联系，我当然无可交代，也就“当然”地吃了拳脚之苦。

从4月份起，我的信件被拆审后才给我看。从5月份起，工资被扣，发给我每月的生活费是14.91元；银行存款被冻结。

我之外的众多“小爬虫”们的日子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很有一些吃皮肉之苦的。其中最惨的，是张俊民。张俊民是一位有十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艺术系团总支书记。在中央表态之后，逃回家乡新蔡县；八二四派人到新蔡把他找回来。回校一看，八二四制造的白色恐怖很怕人，就又逃走。艺术系某些人不善罢甘休，又派人去缉拿，他们在新蔡到处造谣，说张俊民是开封武斗的总指挥，打死了很多。这样，新蔡的造反派就帮助缉拿。最终，连保护他的妹夫也动摇了，就让开封师范学院的造反派把张俊民抓回开封师院。在刚刚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把张俊民关进“牛棚”，对他进行多次批斗，并令韩倩之等“走资派”相陪。艺术系和体育系的一些学生、教师，多次毒打他。因为张俊民在个别要好中说过1959—1962年，新蔡县饿死人的实情；“文革”初又传过毛泽东保护朱德不许北航造反派批判的小道消息，而在揭批时，把毛泽东保护朱德说成了“保护刘少奇”，就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对他的武斗、毒打进一步升级，致使第四节腰椎骨被打断。

在这场反击“翻案风”中，赵文山被打断了腿。河南赴京谈判的开封我方首席代表张本乐的腿也被打断。王秀莲第二次被打成严重脑震荡，住院治疗很长时间。

## 十二、我的“第三次”生命

生命之于人，只有一次，我何有“三次”？

我在母腹成胎，获得生命，这是父母给的。

我两岁丧父，母亲艰难地养我，体弱多病。一次重病不愈，瘦骨嶙峋，即将断气，母亲把我放在煤灰垫的地铺上，准备送出去喂狗。过了许久，母亲以为我已经死了，可一看我，我又活了过来，母亲赶紧做稀面汤喂我。我稍懂事之后，母亲和我的外祖母、舅母、姨母、姑母，都叫我“狗不吃”。这算是“上天”给我的“第二次”生命吧！

1968年4月下旬一天晚饭后，同学们在东工字楼前赛排球，我也挤在人群里看，还不时鼓掌叫好。当时并没有发现周围有人注意我。夜里12点左右，我从睡梦中被63级学生刘俊安等二人叫到东北角的大房间里。刘俊安向我提出了5个曾经多次对我提过的问题，诸如对形势、对“左三红”、对大联合等的看法，我自然和往常一样回答。他令我脱下棉袄，爬在床上。他们用破布塞住我的嘴，蒙住我的眼，把我的两手反绑背后，猛拉两腿，把我拖摔在地板上，一人按住双腿，一人用凶器狠打，打得我昏过去才停下来；等我醒过来，又打；再昏过去，再醒过来，再打，反复多次。打完，等我醒过来，掏出嘴里的布，问我：“卢树森、夏德明（化学系干部）已经跑了，你跑不跑？”我已无力说话，半天才回答：“我已成这样，还咋跑？”他说：“你放老实点，不准对任何人说你挨打！”这才揭开蒙眼布，松开绑，叫我走。我好不容易撑起，扶着墙，挪几步，歇一歇，好半天才回到住室。不能卧床，就左腿支住地板，右腿在床上爬着。口渴得很，一摸暖水瓶，是空的；又摸刷牙缸，也是空的；再摸洗脸盆，反扣着。口越来越渴，简直像冒火，那难受味儿远远超过疼痛的味儿。我愤怒：真狠啊，没把我打死，要把我渴死！大约三点左右，刘俊安来了，他看我还活着，就要走，我忙乞求：“能不能叫喝点水？”他说：“你要想死，我现在就给你弄水。你知道翟贵祥、郭麦秀是咋死的？他俩都不是叫打死的，而是喝水喝死的。”噢，他们是怕我死才倒了我准备的水。我还真不知道挨毒打后不能喝水这个常识。无奈，只好强忍，在床沿爬到大天亮。

啊，这一次我没有死，是打我的凶手有知保住了我的性命。我称之为我的“第三次”生命。

八点多，在大礼堂批判我的那位先生来看我，我要求去医院，他说：“在路线上我们没有调和的余地，但在生活上我们还是要关心你的。”就让刘俊安扶我去医院。出门就是楼梯，我扶着栏杆刚下一阶，就晕倒了。醒来后，刘俊安扶我到楼下，给我一个竹扫帚把，说：“你自己去吧！”楼外就是篮球场，我实在走不动，在压球栏架的石头上坐了半晌才站起来继续走，路上歇了几次，勉强走到校医院。我穿的秋衣被打得稀烂，血肉模糊，和秋衣沾在一起，忍着疼痛请王岐山医生慢慢剪去秋衣，上了药，量了血压，又扶我去透视；又晕了过去，当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透视架旁躺着。医生让我住院。扫地老女工吴秀玉见状掉了眼泪。次日下午，刘俊安就叫我出院。在回住室的路上碰到一位教师，他说：“你要正确对待。”我无恨无怨，还该怎么对待？

我给母亲、伯父写了信，只说“非常想念大人。”伯父先来看我。母亲接着来看我。母亲回到偃师，村里人已经猜到我挨打了，就问：“光耀咋样？能走不能？胳膊腿能动不能？”母亲哭着说：“骨头还没伤着，只要不死、不残废，就是福。”那一年，我母亲来开封看我6次。一次，还是要我“正确对待”的数学系那位教师对我母亲说：“以后准备叫刘光耀回家背锄头哩！”母亲回答说：“我给他准备得现成的！”

在我被打后不久，刘俊安等三个学生到偃师我家，掂着手枪威逼我母亲，硬说我带回家有枪，要我母亲缴出来，把我母亲吓得浑身哆嗦。母亲说：“他回来没带啥东西呀！他的存折还是我去开封看他在饭店交给我的。”母亲把存折交给他们看（共500元左右。1967年“7.15”后，我把存折交给北道门储蓄所，请他们替我保管，年底，我从银行取出）。他们问：“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从此以后，我母亲说起或想起那些学生的凶相，就心里直打寒颤。她的高血压、心脏病就是那时候得的。

刘俊安等回校后，让我披戴上我从化肥厂带回的衣、被、毯子，挂上“大财迷刘光耀”的大牌子游饭厅。有女学生大声问：“那就是给灾区捐款的刘光耀？”任其侮辱，任其损我形象，但我没有做亏心事，我不会有丝毫愧色。

5月中旬以后，令我在左胸戴上一个醒目的大名片：“反革命小爬虫刘光耀”。这在全院也是我独享的待遇。刘俊安等打我时用的什么凶器？我不知道。从我左臂、后背留下的伤痕：小半圆弧形、中心是小方块，可以判断：可能是带有手工打的大盖铁钉的木板。这次拷打是不是事先策划好的？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入睡前里间那位革委会副主任还未回屋，在我挨打过后很久他才回来。从来没有人追查过这事，也没有必要追查。我估计他们是见我无论怎么挨斗都不在乎，就让我大吃皮肉之苦，要我苦得“老实”起来。

我被打之后，造反派中也有责备凶手的。刘俊安是全院闻名的打人凶手。“老保”学生曾在校园内举行过一次声讨打人凶手的游行，横幅上所列的十几名凶手名单中有数学系两名，除刘俊安外是高玉泰（63级学生）。可正是这个高玉泰，在一次去吃饭的路上问我：“你那书桌里的碎钢笔块儿是咋回事？”不知他什么时候进我屋发现的。显然，他已猜着了答案，想再证实一下。那些碎块儿大约有一百多，是我裤子后边口袋上卡的钢笔的变形物。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没啥。”他摇摇头：“太不象话！”

1977年许昌市两名公安人员来向我调查刘俊安的问题时，我除提供打我的情况外，又提供了刘俊安打韩倩之、戴鸿儒、范进堂（院组织部干部）和学生林庆兆、女学生赵玉兰（其实还有他的同班学生曹璞和几个数学系教师中的“老历史反革命”）等。林庆兆的耳膜被打破。范进堂被打以后，拿着绳子外出准备上吊，他想到自杀等于叛党，又取消了轻生的念头。

我问调查者：“刘俊安交代得怎么样？”调查者说：“他一口气交代了6名，和你说的差不

多。”他们还说，许昌就办了刘俊安这一个学习班。我说：“既然如此，就别给他处分了。”调查者吃惊：“你怎么这么想？向别人调查时，都对他咬牙切齿！”我就把他为怕我死所采取的防范措施讲给他们听。他们理解了。我又说：“年轻人嘛，他们也是‘四人帮’的受害者，只要认错就行，重在教育。”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